

汉语词汇的多维探索及拓展研究

匡鹏飞 著

 科学出版社

本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汉语词汇和语法关联互动的理论探讨与专题研究”(14JJD740006)资助

汉语词汇的多维探索及拓展研究

匡鹏飞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录了作者 10 余年来关于汉语词汇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论文共 32 篇。根据内容,所收文章大致被分为四组:第一组 7 篇,主要涉及古代汉语词汇、词义问题;第二组 10 篇,主要讨论虚词问题;第三组 9 篇,包括训诂、文字、标点、引语等方面的问题;第四组 6 篇,是书评。本书不拘泥于传统的汉语词汇研究思路,而提倡汉语词汇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词汇与语法相结合、事实与理论相结合的多维研究思路。由于词语在理解句子和篇章中的基础地位及词语与文字之间在形音义三方面的联系,词汇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能非常自然地拓展到训诂学、文字学等其他领域。

本书读者对象为高校语言学专业教师、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汇的多维探索及拓展研究/匡鹏飞著.—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03-054433-9

I. ①汉… II. ①匡… III. ①汉语—词汇—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0913 号

责任编辑:张 达 / 责任校对:张凤琴

责任印制:张欣秀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c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 × 1000 B5

2017 年 9 月第 一 次印刷 印张:19 1/2

字数:320 000

定价: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很高兴看到了鹏飞的《汉语词汇的多维探索及拓展研究》。在这部书稿里，鹏飞收录了他 10 余年来关于汉语词汇及相关问题的论文 32 篇。贯穿此书的指导思想，是对各种词语现象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力求作出合理的解释；统摄全书的基本做法，是重视“四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词汇与语法相结合，事实与理论相结合。

文如其人。鹏飞为人实在，又有韧性，在务实中求创新，成了他写文章的走向。一个好的学者，不会抱着句号不放，满足于欣赏句号，而是多思多问，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努力向前，求取新知。请看下面从本书摘引出来的两组例子。

第一组：

（例 1）1996 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许嘉璐先生等主编的《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一书中，由许嘉璐和朱小健执笔的“汉语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一章中只包括音韵学、语法学和训诂学，而词汇学不在其中。无独有偶，1998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坚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一书中，古汉语方面设立了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和语法学的专章，同样也没有词汇学。这两本在语言学界较有影响的对中国语言学各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和展望的书都没有设置“古汉语词汇学”的专题，令人感到不解。……究竟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能不能成其为“学”？在中国是否存在“古汉语词汇学”？

（例 2）从语体分类的角度看，诗歌语言属于文艺语体中的韵文体。

与其他书面语体相比，诗歌的语言风格具有十分显著的特色，主要体现为大量存在异于常规的词语搭配和语法结构。但是，这种异于常规的语言现象具体与“常规”究竟有哪些方面的差异？这其中有些什么规律？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尚未能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全面描写和系统总结。本文以现代汉语诗歌中“在十方位短语”结构的非常规用法为研究对象，从个案出发，深入讨论诗歌违反常规语言规则的具体表现形式。

（例3）在浩如烟海的《诗经》著述中，最有影响、最受人们推崇的当属汉人毛亨的《毛诗诂训传》（以下简称《毛传》）和宋人朱熹的《诗集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解释同一部经典的著作，《毛传》和《诗集传》在内容上却各异其趣、大相径庭，不仅对同一诗句作出的解释常常互不相同，在解释的整体风格与特色上二者也相去甚远。那么，这两部在中国《诗经》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哪些方面存在着差异？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异？对于这两个问题前人却很少论及。本文准备以《诗经·邶风·静女》一诗为例，……对比性地探讨和总结毛亨、朱熹在解释《诗经》上的不同特点，从而揭示造成两者对《诗经》的解释产生种种差异的根本原因。

以上三例，分别见于本书第一篇《论古汉语词汇学的学科地位》开头一段、第十五篇《现代汉语诗歌中“在十方位短语”的非常规用法》开头一段和第二十篇《从〈静女〉看〈诗经〉毛亨、朱熹解释的差异》开头一段。文章的论说，都是首先摊摆问题，然后展开讨论，提出答案。换个比喻的说法，文章的写作，都是从问号到句号。

第二组：

（例1）正如梁银峰（2009）所说，时间副词“从来”在产生之初，其用法与现代汉语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吕叔湘（2001）指出它在现代汉语中“多用于否定句”，“一般不修饰单个动词、形容词”，但根据我们的考察，它在中古和近代汉语中的用法并不太受这些限制。那么，时间副词“从来”的语法特点从古至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其原因又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例2）名词虚化为副词毕竟只是少数现象，由名词虚化而来的副词在副词中也只占很小一部分。那么，名词虚化为副词，到底有哪些类型？这些类型之间在

动因、机制、路径等方面的异同如何？与别的实词虚化为副词相比，又有何异同？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以上两例，分别见于本书第八篇《时间副词“从来”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结尾一段和第十二篇《名词虚化为副词二例——“大力”和“死力”的语法化》结尾一段。文章的论说，都是针对题目，展开讨论，得出答案，然后，进一步提出问题，留待今后做更深入的研究。换个比喻的说法，文章的写作，都是从得出立论句号，顺带提及新的问号，表明了自己要走长途，把研究脚印往前延伸再延伸。

设问有其特定作用。当然，如果几十篇文章篇篇都用上设问，反而显得啰嗦呆板。鹏飞的文章，有时适当使用文前设问，有时适当使用文后设问，皆能取得引人关注的效果。他深深懂得问号和句号之间的辩证关系。“问号—句号—问号”的为学过程，便于打开研究通道，易于创新性学说的形成。

鹏飞攻读过古代汉语硕士学位，又攻读过现代汉语博士学位，他有足够的“本钱”在从古至今的历时纵线上研究汉语问题。正因如此，他这部书能够不拘泥于传统的汉语词汇研究思路，作了不少的独立思考，展示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和说法。他把书的题目定为《汉语词汇的多维探索及拓展研究》，反映了他对词汇研究有自己的思路 and 办法，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汉语词汇研究的深入。

鹏飞跟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了近 20 年。在我的心底里，他是一位很稳重、有信用、能放心的学者。我相信，在学术道路上，他能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长长的路子！

邢福义

2017 年 4 月 2 日

目 录

序	邢福义 (i)
论古汉语词汇学的学科地位	(1)
“地位”和“地步”的词义演变及相互影响	(12)
《诗经·国风》AA 式结构之考察	(24)
从《拍案惊奇》到现代汉语词义演变的考察	(32)
试析《拍案惊奇》双音单义词在现代汉语中消失的原因	(47)
《汉语大词典》补订八则——读《二拍》札记	(59)
“度”和“渡”	(63)
时间副词“从来”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	(66)
论《二拍》和现代汉语“从来”的语法差异	(77)
副词“从来”语法特点的历时差异及其解释	(88)
语气副词“明明”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97)
名词虚化为副词二例——“大力”和“死力”的语法化	(110)
现代汉语“X 力”式副词词族研究	(122)
连词“无论”形成发展的历时考察	(138)
现代汉语诗歌中“在+方位短语”的非常规用法	(150)
武汉方言中的用事成分标记词“过”和“架”	(159)
武汉方言中的长音式状态形容词语及其与 ABB 式状态形容词的关系	(171)



佛教文化与中国古代语言研究	(185)
《论语》郑玄与朱熹解释之比较	(189)
从《静女》看《诗经》毛亨、朱熹解释的差异	(199)
楚简文字与甲骨文、金文之间的形体演变特点	(207)
楚简异体字形与代表字形的形体差异比较	(224)
楚简“示”部字与楚国巫文化	(234)
俗文学视角下的《二拍》用字研究	(244)
古代白话小说点校本中的标点问题——以《二拍》为例	(254)
论《歧路灯》直接引语结构成分的特点	(258)
汉语词汇研究的新创获——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	(272)
词语本质的多维诠释和词汇理论的立体建构——《从认知到哲学： 汉语词汇研究的新思考》读后	(277)
汉语词汇与语法结合研究的新模式——《词汇—句法语义的衔接研究》 读后	(282)
十年辛苦不寻常——读《文化语言学》(增订本)	(290)
语言研究和社会需要的结合点：语言教育	(293)
“二重证据法”的深化拓展和创新运用——读高华平教授《楚简文字与 先秦思想文化》	(296)
后记	(300)

论古汉语词汇学的学科地位

199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许嘉璐等主编的《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一书中，由许嘉璐和朱小健执笔的“汉语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一章中只包括音韵学、语法学和训诂学，而词汇学不在其中。无独有偶，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坚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一书中，古汉语方面设立了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和语法学的专章，同样也没有词汇学。这两本在语言学界较有影响的对中国语言学各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和展望的书都没有设置“古汉语词汇学”的专题，令人感到不解。其实，细细翻阅语言学刊物就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在各类语言学的目录索引中一直都很少设立“古汉语词汇”这样的条目。究竟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能不能成其为“学”？在中国是否存在“古汉语词汇学”？

—

汉语的语言研究实际上是从研究词汇问题开始的。先秦诸子对名实关系的探讨，先秦文献中对词义的训释，虽不是专门的、自觉的语言研究，但已经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萌芽了。到了汉代，以词汇研究的繁荣为特征，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尔雅》是一部百科性质的同义词典；《方言》搜集了大量的方言词汇；《释名》则探讨了词语的得名之由。到有清一代，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在古音学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把古音学的成果又运用到考释词义中，因声求义，推求语源，使古汉语词汇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可见，“自古以来，随着语言研究的发生、发展，就有词汇研究的发生和发展”（刘叔新，1990：1）。不过，古代的词汇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中国古代学

者还没有建立“词”的观念而只有“字”的观念，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探讨的是“词”的问题而只认为在研究“字”。其次，中国古代学者的词汇研究要么是对一个个具体的词语意义进行随文释义式的解释，要么是对词语意义进行搜集整理，汇编成专书。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的词汇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既不能用联系的观点对词汇作整体研究，只是孤立地去解释一个个的词语（当然，清代学者在这方面有所进步），又缺少对古汉语词汇理论上的思考和探讨，它尚处于语文学阶段。第三，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以汉字为中心，从汉字的形、音、义三方面展开，从而形成文字、音韵、训诂这三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部门。古代学者的词汇研究基本就是对他们所认为的“字”义的解释，被包含在训诂学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古代汉语词汇研究并没有取得一个独立的地位。

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从此，中国的语言研究告别了语文学阶段，走上了科学的语言学的道路。经过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的书面语地位，由此，中国语言学也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形成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大阵营。受西方语言学说的影响，以《文通》的出版为契机，语法研究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现代汉语语法学的顺利建立自不待言，古代汉语语法学也改变了从前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研究状况，从原来所依附的训诂学中名正言顺地独立出来，在古代汉语诸分支学科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现代汉语的研究，由于受到“语音、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三要素”的现代语言学观念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先后建立了现代汉语语法学、语音学、词汇学以及其他分支学科。“现代汉语词汇学以中国传统语文学中的训诂学、文字学的巨大成就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周荐，1995：1）。虽然同现代汉语语法学相比，现代汉语词汇学显得比较冷清，成果相对而言不那么突出，但它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分支学科毕竟已是被语言学界公认的事实。而从理论上说应该存在着的与之对应的古代汉语词汇学却一直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如前所述，古汉语词汇研究一直包含在训诂学之中，并且对词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训诂学的核心部分。因此，在长期没有解决古汉语词汇学与训诂学的关系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沿袭旧的体制，把现代学者所进行的古汉语词汇研究依然归入训诂学的范畴。本文开头提到的两本书中就并非没有关于古汉语



词汇方面的内容，而是都按照“惯例”把它包括在训诂学部分了。

从现实来说，自中国现代语言学创立以来，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方言学等分支学科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较而言，唯独词汇学一直没有大的突破，而古汉语词汇研究尤其薄弱。正是由于这种落后的局面导致了古汉语词汇学迟迟不能被语言学界认同而正式取得一个“学科”的地位。

二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没有词汇，语音就无所依附，语法便失去基础，语言也就不成其为语言了。因此，词汇在语言中占据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那么，词汇学成为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古汉语词汇学也是如此。古代汉语词汇同样是古代汉语的重要因素，只要研究古代汉语，就不能不涉及古代汉语的词汇和词义。古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古代汉语的总体面貌，寻求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了解现代汉语词汇何以形成，同时，还有助于古典文献的阅读，从而促进古典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医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因而，无论是从古代汉语还是从现代汉语，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需要上来看，古汉语词汇学都应该是一门学科，它的产生是迟早的、必然的。

事实上，近 20 年来，古汉语词汇研究已大大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领域日益扩展，研究深度不断加强，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果，不断朝着“学”的目标前进。

具体地说，近年来古汉语词汇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对象的明确。有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古代的词汇研究属于训诂学的范畴，它没有独立而明确的研究对象，当然也就不能成为一门“学”。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们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训诂学的束缚，把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先秦两汉的词汇词义上，对上古典籍中生僻词语意义的考释几乎成为古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唯一工作。但最近 20 年来，古汉语词汇学界已经认识到从中古到近代的词汇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重



要作用,在继续研究上古汉语词汇词义现象的同时,一部分学者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古和近代汉语的词汇上,并取得了很多喜人的成果。王力《汉语史稿(下)》(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词汇史专著。该书以时间为经,以问题和一个个具体的词语为纬,确定了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描写了若干词语的形、音、义历史演变的轨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书中已经涉及了很多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问题并设立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新词”的专章,这显示了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这部著作作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多方面的基础,不愧为汉语词汇史的奠基之作。郭在贻的《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专设《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一章颇为引人注目。作者明确提出俗语词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呼吁要加强对方俗语词的研究,这无疑击中了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关键。郭著的这一章,从俗语词研究的意义、历史和现状、材料和方法、展望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关于俗语词研究的种种问题,既有理论深度,又不乏丰富例证,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从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理性认识阶段的标志之作。此前,郭在贻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近代汉语俗语词的考释文章都是方法科学、持之有据的典范之作。比较令人为之振奋的是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它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专著,可以视作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代表。把古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从上古到近代的汉语历史词汇在古汉语词汇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进步。

2. 研究目标的树立。古代的小学研究多是为解经服务的,古人研究语言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读懂古书,这种研究还没有达到语言学的高度。而最近20年来,学者们已开始用语言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和开展古汉语词汇研究,将研究目标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对一个个具体的词汇现象和问题作细致深入的探讨、力图从理论上对它们进行科学解释的基础上,致力于把古汉语词汇学发展为汉语历史词汇学;另一方面,以描述一个个词语意义的历史演变情况、弄清楚每一个时代的词汇面貌为出发点,着力于建立汉语词汇史。

在对具体词汇理论的探讨和词汇问题的专题性研究方面,学者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词源和同源词的问题。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



馆 1982 年版) 及其中所附的《同源字论》堪称汉语词源研究中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王力吸取了章太炎和高本汉等人的教训, 提出了确定同源词的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 即同义或意义相关、读音相同或相近、有同一来源, 因而他在系联同源词时能按照这三个条件做到严格把关, 宁缺毋滥。同时, 他还运用了大量古人的训诂材料加以证明, 这就更加强了其工作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因此,《同源字典》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张永言的《关于词的“内部形式”》(《语言研究》1981 年创刊号) 一文, 全面论述了什么是词的“内部形式”以及如何探寻词的“内部形式”的问题, 该文在汉语词源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任继昉《汉语语源学》(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 首次建构出了一个汉语语源(词源)问题的理论框架。殷寄明《汉语语源义初探》(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 以“因声求义”为总的指导思想, 首倡“语源义”的概念, 并详细论述了与“语源义”密切相关的文字、词汇、训诂及古代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二是关于词义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 王力借鉴西方语言学的观点, 提出了汉语词义演变分为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三种情况的观点。80 年代以后, 古汉语词义研究不断深入。陆宗达、王宁的《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载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全面探讨了词义引申的规律, 总结出词义引申的 10 多种方式, 使人耳目一新。之后不断有人拾遗补阙, 如孙雍长《古汉语的词义渗透》(《中国语文》1985 年第 1 期)、许嘉璐《论同步引申》(《中国语文》1987 年第 1 期)、蒋绍愚《论词的“相因生义”》(载《语言文字学术论集——庆祝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 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张博《组合同化: 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中国语文》1999 年第 2 期) 等。而罗正坚《汉语词义引申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则是第一部关于词义引申的专著, 它全面研究了关于词义引申的种种问题。

除了以上两个热点问题以外, 关于古汉语词汇专题性的理论探讨的重要文章还有蒋绍愚的《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中国语文》1989 年第 1 期) 和《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国语文》1999 年第 5 期)。在前者中, 蒋绍愚提出了应当从 4 个方面来考察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 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 有哪些义位, 没有哪些义位是不同的; 义位结合成词的



情况也有变化；词的聚合关系、组合关系的变化；词语亲属关系的变化。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从词汇系统透视词义系统，以义位为研究单位，以义位在语义场中的关系为研究起点，以整个汉语的词汇系统和深层的词义系统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标。”（周光庆，1992）该文在古汉语词汇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站在语言学的高度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索，已和古人为了读懂古书而进行简单的词义解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作者经过10年的再思考，又在后者中提出了两次分类的思想，认为各种语言把哪些事物、动作、形状概括为一个义位，是第一次分类，哪些义位结合成一个词，是第二次分类，两次分类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词汇系统之间的差别，考察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就要考察一个词的主要义位的义域古今是否有变化以及这个词的各个义位古今是否有变化。这是作者对自己10年前观点的进一步超越，如果说前者主要还是就汉语而研究汉语、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话，后者则是把古汉语词汇研究上升到人类对世界认知的高度，从语言词汇发展的普遍规律着眼观察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作者的这种进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进步，更代表着整个古汉语词汇研究水平的进步。

关于汉语词汇史方面。史存直的《汉语词汇史纲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篇幅不大，但体例严谨，材料翔实。他十分突出社会发展和词汇发展的关系，并首次把构词法的发展正式纳入汉语词汇史的结构框架之中。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设立“同义词的发展变化”一章较有新意，“词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一章虽稍显简略，创见不多，但也表明了作者试图探索汉语词汇发展演变规律的努力。王力的《汉语词汇史》（收入《王力文集》第十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是他在《汉语史稿（下）》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主要的框架变化不大，只是对某些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完善，例证材料也更丰富了。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的中编“汉语词汇史”分为“上古汉语词汇的发展”“中古汉语词汇的发展”和“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三章，以时间为线索，以各个时代词汇发展的规律为骨架，以词汇材料的举例为主体。三章分则是三部断代词典，合则为一部汉语词汇史，体现了作者独到的匠心。该书对历来不太为人重视、研究得不够深入的中古、近代汉语的词汇发展着墨尤多，实属难得，它也因此可以被认为是第一部较完整的汉语词汇



史。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提出应大力开展对古汉语常用词的衍变递嬗的研究,使之与疑难词语的考释齐头并进,从而逐步建立科学的汉语词汇史,并在文中以8组常用词在中古时期的变迁交替为例做了示范性的研究。

3. 研究方法的更新。传统的词汇研究方法往往只限于随文释义、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同源系联等训诂学中常用的方法。最近20年来,随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思想观念的更新,古汉语词汇研究中新的方法不断涌现。程湘清的《〈论衡〉联合式双音词的语义构成》(载程湘清主编《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和《〈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载程湘清主编《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均运用了穷尽式的统计方法,对专书中的某一类型的词汇作定量、定性的分析,进而做纵向的对比研究,从中探求汉语词汇发展的某些规律。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两部同年出版的著作都不约而同地把国外语义学的理论引入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之中,这是古汉语词汇研究在语言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革新。特别是后者在有意识的运用语义学的方法研究古汉语词汇问题上贡献尤大。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本书的另一个意图是在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中努力把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和现代语义学的理论结合起来。……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所创新,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周光庆《汉语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心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一文,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词义引申,论述了文化心理因素在汉语词义引申中的重要作用,观点新颖,分析深刻。王宁《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创造性地用义素分析法研究同源词的造词理据,黄易青《同源词义素分析法》(《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则对这种方法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同源词研究方法的新突破。齐冲天《声韵语源字典》(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不囿于成说,独创性地提出“一字(词)两源”的观点,这是词源研究的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吕东兰《从〈史记〉、〈金瓶梅〉等看汉语“观看”语义场的历史演变》(载《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一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以语义场为单位研究其历史演变,是对前文所述蒋绍愚1989

年文章提出的研究思路的个案实践。周光庆《汉语词汇研究的新思考》(《汉语学报》2000年创刊号)一文,主张从符号论、本体论和言说论三个角度对古汉语词汇进行立体式的研究,继而达到以人为目的的新综合。这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超前性的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新思路,应引起学界的重视。

4. 理论建设的突破。对古汉语词汇学理论框架的建构,是近20年来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创获。在1980年以前,没有一本古汉语词汇的通论性专著出版,表明了在这以前学者们对理论建设的忽视。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林仲湘《古汉语词汇常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赵克勤《古汉语词汇概要》(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是这方面较早的成果,但它们都偏重于对古汉语词汇知识的普及,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稍显逊色。周光庆的《古汉语词汇学简论》率先构拟了一个古汉语词汇学的理论框架,他有意识地把古汉语词汇研究上升到“学”的高度。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也建构了一个古汉语词汇学的理论体系,论述了古汉语词汇学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特点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和阐释。之后还有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其特点是体系较完备,执论较公允,对每一个问题都谈得比较全面,但同上述二著相比,稍欠创新精神。关于古汉语词义的通论性著作也不断问世,先后有洪成玉《古汉语词义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苏宝荣和宋永培《古汉语词义简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高守纲《古代汉语词义通论》(语文出版社1994年版)等。上述通论性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古汉语词汇学理论建设的重大突破,反映了古汉语词汇研究正在逐渐走向成熟。

20年来,在古汉语词汇学方面值得一提的论著远不止上述简单评介中提到的,但仅此就足以说明这些年来古汉语词汇研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应该说,作为一个学科,古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对象已基本明确,研究目标已基本清晰,研究方法已基本形成,术语体系已基本统一,理论框架已基本具备。如果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确实不存在古汉语词汇学的话,那么立足于古汉语词汇研究已经取得质的变化的事实,我们认为,至今仍然否认古汉语词汇学存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依旧忽视古汉语词汇学这门学科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而



作为近年出现的全面总结中国语言学成绩的著作，不设立古汉语词汇学的专章或专题更是有欠妥当、不尽合理的。

三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同汉语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古汉语词汇学目前还比较落后，它离一门成熟的、繁荣的学科还有不小的差距。

古汉语词汇学与训诂学长期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极为混乱，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能达成一个共识。这不利于古汉语词汇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之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三者并列本已可议，况且训诂又不全是词汇研究，所以古汉语词汇学从传统训诂学中独立出来，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包罗万象，在科学分工日益细致、学术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必然很难继续找到立足之地，因此，“它势必要把自己原有的材料和已提出的课题，放到语言学各部门去分属与分担，形成一个分类研究的新局面”（王宁，1996：13）。传统训诂学旧质的终结是必然的，并且，它也不会再回头来扰乱业已形成的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新格局，侵占别的学科的研究范围，而是在继承旧训诂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适应科学的发展，结合时代的需要，形成一门既独立而有学科特色、又和其他相关学科有密切联系的新学科。对此，大多数学者持乐观态度。这样，古汉语词汇学就名正言顺地和现代汉语词汇学相对应，正式成为了古代汉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与训诂学划清了界线。

从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来说，古汉语词汇学应进一步发展成为汉语历史词汇学。古代汉语一般来说只指先秦两汉的汉语，古代汉语词汇学因而似乎只是一个断代的“上古汉语”词汇学，似乎只是一门静态的、描写性的学科。这样，它不仅与一般人心目中的“古汉语”词汇学有一定差距，而且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大为减小。而汉语历史词汇学则可以也应该包括对上古、中古乃至近代各时期汉语词汇面貌和词汇现象以及汉语词汇发展的整个历史的研究。

就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现状来说，还存在很多问题。早在1986年，颜洽茂就在